

当代西方左翼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幻象与谬误^{*}

雷 禹

【内容提要】随着资本主义数字化和技术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当代西方左翼技术封建主义思潮认为，数字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导致经济剥削的弱化、社会结构的固化、劳动者的依附加深以及民主政治的衰退，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征用的出现、新等级制度的形成、“云农奴”的产生和专制制度的兴起。该思潮认为，这些变化造成的后果是资本主义本身正在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技术封建主义的来临。然而，西方左翼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在实质上并没有认识到技术封建主义只是数字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转型的表现，忽视了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被资本主义数字化和技术化的幻象所迷惑，进而作出过于盲目的判断。揭示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幻象与谬误，警惕其产生的迷惑性，认清数字资本主义的真正本质，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西方左翼 技术封建主义 数字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 数字经济

作者简介：雷禹（1990-），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 430079）。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些令人惊异的现象，这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与封建主义极为相似的特征。部分科技巨头和平台企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和巨大的权力，这种地位就如同封建时代的领主。与之相对的是，广大用户沦为依赖这些平台的“农奴”，完全失去对自己的数据和劳动成果的控制权。有的西方左翼学者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结构性变化指认为技术封建主义，即资本主义正在走向自身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技术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的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正在从全球资本主义的废墟中崛起，这种秩序被称为技术封建主义或云资本主义，它使真正的资本家及其剥削的工人从属于由我们的新封建主（贝索斯、马斯克、比尔·盖茨……）控制的垄断数字公地。”^①在这种新形态中，技术巨头成为新的封建“领主”，普通用户则成为被剥削的“农奴”。这就是广泛流行于当代西方左翼理论界的技术封建主义思潮。该思潮以雅尼斯·瓦鲁法基斯、约迪·迪恩、塞德里克·杜朗、乔尔·科特金、叶甫根尼·莫洛佐夫等西方左翼理论家为代表，试图引发一场关于资本主义变革的深刻讨论。这种思潮不仅是对当前数字资本主义或平台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次新的挑战。然而，是否如技术封建主义理论家所宣称的那样，资本主义正在终结，封建主义逐渐回归？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西方左翼技术封建主义思潮不仅深陷资本主义发展的多重幻象之中，而且没有真正把握数字资本主义发生变化的实质，对其性质作了过于盲目的宣判。对于这种论调，我们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识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发展趋势研究”（24&ZD009）、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晚期资本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欧内斯特·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研究”（23FKSB038）的阶段性成果。

^① Slavoj Žižek, *Christian Atheism: How to Be a Real Materialist?*, London: Bloombury Academic, 2024, p. 202.

别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理论实质，警惕其可能引发的错误倾向，又要真正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是我们应对当前西方流行的形形色色的思潮挑战的正途。

一、“终结”还是“复归”：

当代西方左翼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多重幻象

当代西方左翼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核心观点是：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刻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正在经历一种巨变，资本主义逐渐走向“终结”，而向封建主义“复归”。在这种视角下，数字产权、平台垄断和集中化趋势被看作资本主义向封建主义转变的标志，资本家则被描绘成新时代的封建领主，他们通过征收租金而非追求利润的方式来积累财富。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雅尼斯·瓦鲁法基斯指出：“资本变得越来越强大，但资本主义正在消亡。一种新的体系正在接管。在这个体系中，新的统治阶级既拥有并经营润滑它的国家资金（而不是利润），也拥有新的非市场领域，在其中，极少数人让大多数人为他们工作。”^① 资本主义发生的这些变化，极大地激发了技术封建主义的倡导者宣判资本主义终结的热情。面对技术封建主义理论家们众口一词的观点，我们不得不冷静思考一个问题：资本主义产生的这些现象和变化，是否意味着它在本质上发生蜕变？我们认为，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家的批判同样适用于此：“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②。马克思指出，“事物在其现象上往往颠倒地表现出来”^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经济过程中的本质不仅和现象相分离，而且常常以颠倒的形式呈现出来。遵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路，审视当今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宣判，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呈现出封建主义的特征，并非其自身的终结并向封建主义复归，而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继续演进和转型。基于此，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沉迷于一系列新现象而落入数字资本主义营造的幻象之中，由此在理论上产生了诸多迷失。

1. 幻象一：经济剥削的弱化与政治征用的出现

技术封建主义思潮认为，在传统资本主义体系中，经济剥削主要通过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直接控制来实现。工人的劳动力被视为商品，它在市场上被资本家所购入的交换价值低于其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这就实现了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直接榨取。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这种直接的经济剥削模式正在发生变化。

首先，技术的自动化和智能化降低了对传统劳动力的依赖，这导致经济剥削的形式变得更加隐蔽。在数字经济中，剥削不再仅仅依赖于对劳动力的直接控制，而是借助对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利用来实现。用户的个人信息、消费习惯、社交网络等数据成为新的“矿产”，并被科技公司以各种方式开采和利用，进而实现价值的转移和积累。

其次，随着平台经济的盛行，劳动者的自主性看似增强，实则陷入更加复杂的剥削关系之中。平台公司依靠算法对劳动者的工作进行监视和调控，他们的收入和工作条件受到算法的严格控制。对于这些时刻运作的算法，劳动者却几乎一无所知。这使得剥削关系变得更加隐蔽，劳动者往往难

① Yanis Varoufakis and Evgeny Morozov, “Yanis Varoufakis on Crypto, the Left, and Techno – Feudalism”, <https://the-crypto-syllabus.com/yanis-varoufakis-on-techno-feudalism/>.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16页。

以意识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犯。

最后，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征用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手段开始出现。随着国家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政府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来征用技术资源并以此进行社会治理，目的是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这种征用不仅表现为对数据的收集和利用，也体现在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垄断。凭借立法、监管等手段，政府要求科技公司提供用户数据，借以实现对治安、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控制。然而，这种政治征用往往以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导致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动机鲜为人知。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代表之一约迪·迪恩指出：“就像领主对国王一样，脸书和谷歌与强大的国家合作，分享这些国家依法禁止收集的信息。总体而言，网络技术的征用已无处不在，具有侵扰性和不可避免性。科技巨头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全过程的掌控者。”^① 科技公司在此过程中往往扮演双重角色，既是数据的收集者和利用者，也是被政府征用的对象。这种复杂的权力关系致使政治征用的过程充满争议和不确定性。

从经济剥削的弱化到政治征用的出现，这种剥削方式的演变被看作从资本主义向技术封建主义过渡的标志。在此过程中，资本家的角色越来越类似于封建时代的领主，他们通过索取“数字地租”而非直接剥削剩余价值的方式来积累财富。

2. 幻象二：社会结构固化与新等级制度的形成

技术封建主义的重要表现就是社会结构的固化与新等级制度的形成。首先，科技巨头的市场主导地位是社会结构固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等公司纷纷崛起，它们凭借控制数据和平台，打造一种新的市场并占据主导地位。斯尔尼塞克指出：“21世纪的资本主义，找到了大量新的原材料——数据。通过一系列的发展，平台已经成为组织企业越来越主流的方式，从而垄断数据，然后提取、分析、使用和销售这些数据。”^② 这些科技公司通过算法和人工智能在决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对其他企业和消费者产生深远影响，其在数字经济中的地位可与中世纪封建领主在当时的影响力相提并论。平台的这种主导地位造成社会结构僵化，新兴企业和创新者难以进入市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固化。

其次，数据产权的集中控制是形成新等级制度的关键。通过集中控制数据产权，科技巨头占有原始数据生产者的经济收益，并逆向控制其社会交往，由此成为寄生的收租者和封建领主式的食利者。这种控制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其中新的统治阶级掌握国家货币和非市场领域，依据“赢者通吃”的模式制造社会断裂。“今天的科技领袖们越来越像一个排他性的统治阶级，控制着少数几家异常强大的公司，就像各地的贵族一样，他们往往抵制任何权力的分散。随着他们征服越来越多的珍贵数字资产，他们正在建立一个分层更加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这导致阶级分化日益扩大。这种情况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有体现。”^③

再次，网络平台或数字资产的集中化加剧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通过拥有垄断性的网络平台和数字资产，科技公司能够像封建领主一样征收租金，而无须参与生产性劳动。平台和资产集中在科技公司手中，这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产阶级持续衰落，以及无产阶级“新农奴”大量涌现。

最后，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和中产阶级的衰微也是不可忽视的现象。技术封建主义的盛行不仅在发达国家内部造成社会结构的固化，也在全球范围内加剧北方国家对“全球南方”的掠夺。同

^① Jodi Dean, “Neofeudalism: The End of Capitalism?”, in Penny Lewis, Lorens Holm and Sandra Costa Santos (eds.), *Architecture and Collective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p. 46.

^② [加拿大] 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7页。

^③ Joel Kotkin, *The Coming of Neo Feudalism: A Warning to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20, pp. 27-28.

时，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许多传统的中产阶级职业被取代，而新的就业机会往往集中于高技能和低技能两端，造成中产阶级的萎缩和社会结构的僵化。

技术封建主义深刻制约着当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权力关系。它通过经济层面的财富和资源的集中、政治层面的政策制定以及社会层面的交往依附关系，重塑社会阶层和权力的分配，加剧社会不平等，形成新的等级制度，进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严峻挑战民主政治和社会公正。

3. 幻象三：劳动者的依附与“云农奴”的产生

在数字时代，技术封建主义正逐渐重塑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催生一种新型的依附关系——“云农奴”现象。这不仅变革传统的劳动模式，也对社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技术封建主义的兴起诱使劳动者与数字平台之间形成一种新的依附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于封建时代的农奴制度，劳动者在无形中成为数字平台的“云农奴”，为数字平台提供大量免费劳动力。“我们已经看到，随着互联网公共空间的封闭，云资本如何崛起，以及它与其他类型的资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在不损害其所有者的情况下自我复制，将我们所有人变成云农奴。”^①

其次，这种新的依附关系以一种更加隐蔽和复杂的方式出现。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点击广告、参与在线活动等方式，劳动者无意中成为为云资本家增加其资本价值的免费劳动力。“在搜索引擎、应用程序和智能设备的背后，是大量的工人，他们被放逐在全球化体系的边缘，缺乏其他选择，被迫清理数据和监督算法，仅能挣得几美分的报酬。”^②

再次，这种依附关系与数据控制密切相关。数字平台利用算法监控和行为矫正，限制用户的选择自由，结果是使他们对平台形成长期的依附关系。在此过程中，用户的行为不断被分析和调整，以使平台的利益最大化。“数字革命可能正在把雇佣工人变成云端无产者，他们在算法老板无形的拇指下过着越来越不稳定、压力越来越大的生活。”^③

最后，技术封建主义不仅促成劳动者的依附关系，还形成新的封建等级制度。云资本家凭借垄断数据和平台，成为新的数字领主，而普通用户则沦为“云农奴”。这种新等级制度造成社会流动性急剧下降，贫富差距愈发拉大，劳动者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血汗工厂以更具冲击性的姿态回归世界，而且数字血汗工厂比维多利亚时代的血汗工厂更有利于资本家盗窃工资。”^④

在技术封建主义的框架下，“云农奴”的出现标志着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依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种依附不仅表现在劳动者对资本的依赖上，还体现在资本家通过数字平台的控制和算法的引导来加强对劳动者的影响和控制上。这种变化不仅极大地变革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也对传统民主政治和经济模式提出挑战，进而对社会结构及政治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

4. 幻象四：民主政治的衰退与专制制度的兴起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使得民主政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随着技术封建主义的出现，技术封建主义理论家认为民主政治的颓势日益严重，而专制的程度却在不断加深，这一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莫罗佐夫认为：“无论是民主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纯粹的’古典自由主义，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终结都不再意味着更美好的一天的到来。”^⑤

① Yanis Varoufakis,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 London: Bodley Head, 2023, p. 118.

② [英] 菲尔·琼斯：《后工作时代：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力》，陈广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第2页。

③ Yanis Varoufakis,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 London: Bodley Head, 2023, p. 85.

④ [英] 菲尔·琼斯：《后工作时代：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力》，陈广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第59页。

⑤ Evgeny Morozov, “Critique of Techno – Feudal Reason”, *New Left Review*, Vol. 133, No. 1, 2022.

首先，民主政治的退化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它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多方面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封建主义的崛起加剧民主制度的衰退，因为它诱发权力和资源进一步集中，促使少数科技巨头或平台企业像封建领主一样掌握大量数据和权力，而普通用户则像农奴一样被束缚在这些平台上。“这种新封建主义的经济地位是与当今后民主国家中这一阶层政治权力的增加联系在一起——上层阶级专门利用这种政治权力来维护其经济利益。新的财富寡头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使前现代的社会阶级形态重现，在这种社会阶级形态中，政治与市场、法律与经济之间几乎没有界限。”^①

其次，这种权力结构的转变导致“从契约到身份”的退步。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资本主义并未走向一个更加平等和自由的未来，反而出现了类似于封建时代的形态。“在这个新的政治舞台上，社会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不再以资本为一方，以劳工为另一方，让社会民主政府充当裁判，迫使双方妥协。取而代之的是，中间派和极右翼都在追随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云主义者，他们的上台是云主义者一手促成的，而左派则忙于就‘女性’的定义、压迫的等级以及其他问题展开内战。”^②在这种形态下，普通用户失去对自身数据和劳动成果的控制权，呈现出一种前现代式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等级。

最后，技术封建主义的弊病无法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被克服。这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内在痼疾与弊端，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难以克服的治理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更在政治领域得以显现。专制制度的盛行正是这种挑战的直接后果，它标志着民主政治的退化和专制力量的增强。

技术封建主义的诞生不仅标志着民主政治的颓败，也预示着专制制度的复兴。在西方左翼技术封建主义理论家看来，这种转变揭示数字资本主义发展从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重新退回到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表明资本主义在走向自身的终结。

综合以上四大幻象的论述，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揭示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和内在矛盾。该思潮观察到的新的依附关系、权力结构和社会等级形成等趋势，确实表现出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新特征。然而，这些现象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消亡或社会结构倒退至封建主义。相反，它们更多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极化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统治的不断加深。尽管这些新现象在形式上与封建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新样态，其根本性质仍然是资本逻辑的进一步延续。因此，我们不应将这些变化误解为资本主义的终结或封建主义的复兴，而是要认识到这是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我调整和纵深发展。因此，技术封建主义理论家被数字资本主义各方面表象层面的变化所迷惑，遗漏了现象背后的真正本质，主观臆断地作出资本主义向技术封建主义倒退的结论，以至于陷入数字资本主义营造的种种幻象而看不清它的本质。总的来说，技术封建主义理论家的分析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即强调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和变化性。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尽管表现形式有所变化，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的本质却始终未变。

① Sighard Neckel, “The Refeudaliza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6, No. 3, 2019.

② Yanis Varoufakis,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 London: Bodley Head, 2023, p. 184.

二、“质变”抑或“转型”： 当代西方左翼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主要谬误

西方左翼学者对于技术封建主义的迷恋，不仅显示出他们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理论困惑，也暴露其在立场上的迷茫。他们对封建主义的“拥抱”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而不是对问题的深刻洞察。这种倾向如果不加以纠正，可能会致使左翼思想在西方进一步边缘化，进而越来越远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分析方法。因此，对技术封建主义的批判需要更加严谨的理论基础和深入的实证研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尽管看到当下数字资本主义的诸多变化，也揭示出其诸多矛盾和困境，但却误以为资本主义本身正在走向终结，进而为技术封建主义所取代。在这一点上，技术封建主义思潮陷入数字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所编织和构造的幻象，而失却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清醒认识。原因在于，这些变化只是数字资本主义转型所呈现出来的新样态，而非本质上的彻底改变。正如德国学者汉斯-彼得·马丁和哈拉尔特·舒曼尖锐指出的那样：“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结绝对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由于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① 这是一种在资本推动下所产生的“全球化陷阱”。

1. 对剥削与征用的误判：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界限模糊

在探讨当代西方左翼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时，一个显著的误区是对剥削和征用概念的混淆，这种混淆造成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界限认识的模糊化。认识上的含糊不清不仅扭曲我们对当前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解，也干扰我们对技术发展和社会变革方向的判断。

首先，剥削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特征之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主要表现为资本家通过控制和占有工人的劳动而获取剩余价值，它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商品经济为基础，并依据法律和市场机制得到维护和强化。然而，在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视角下，剥削被看作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忽视其所产生的根本支撑，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哈里森看来，西方的推特、色拉布、拼趣、红迪网和脸书等“充当数字地主的社交媒体公司碰巧通过占有行为来剥削租户生产者，导致剩余劳动力以数字农作物份额（数字产品租金）的预定形式从租户生产者流向数字地主，这就向剥削理论家呈现了21世纪由互联网支持的封建佃农制的真实经济形式”^②。关于数字资本主义平台的“数字地租”的性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地租的时候已经明确指出，“一切地租都是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产物”^③。因此，所谓的“数字地租”尽管在形式上类似于封建社会的地租，但实质上却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从云地租来研究资本主义的衰亡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数字技术下的云地租与封建地租只有外表上的相似性，但其中构成的基本内容，以及两者各自蕴含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之间有着霄壤之别。”^④

其次，征用是封建主义的典型特征。在封建社会中，领主通过对土地的控制，强制农民为其提供劳动和产出，这种关系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基础之上。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将

① [德] 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张世鹏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1页。

② Stan Harrison, “Digital Feudalism: Sharecropping, Ground Rent, and Tribute”, *Rethinking Marxism*, Vol. 33, Issue. 2, 2021.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15页。

④ 蓝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技术封建主义思潮评析——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审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年第5期。

现代技术平台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与封建时代的征用行为相提并论，并将之视为一种新的封建征用形式。然而，这种类比无视现代技术平台与封建领主在权力结构和社会功能上的根本差异，以及其背后反映的生产关系上的根本区别。

最后，这种对剥削与征用的误判，模糊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界限。一方面，它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将其简化为技术发展的结果，进而轻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剥削行为的制度性支持。“随着1995年互联网的私有化，资本成功地控制了数字公有财产，将其归类为私有财产，并将私有互联网的公有财产作为普遍私有财产推广到全世界。从那时起，拥有作为普遍私有财产的数字公有财产所有权的单个资本就披上了数字土地所有者的外衣。”^①另一方面，它将现代技术平台的行为与封建时代的征用行为等同起来，漠视两者在权力结构和社会功能上的本质区别。

这种模糊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界限的做法，不仅妨碍我们深入把握当前的社会经济格局，也削弱我们对技术演进和社会变迁趋势的准确预测能力。它可能造成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问题的理解过于简化，以及对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社会变革的过度乐观或悲观倾向。对于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来说，乐观的是，资本主义正在走向自身的终结；悲观的是，终结之后复归到封建主义时代。然而，这两种矛盾的态度都源于其未能真正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

2. 对社会结构固化的误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技术变革

在西方左翼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看来，技术变革并不是总被视为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力量，而是常常被误解为社会结构固化的催化剂。这种思潮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技术进步往往被用来巩固既有的权力结构，而非打破它们。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在这一问题上过于强调技术本身的变革带来的后果，而对更为重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置若罔闻。

首先，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往往将技术变革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固化的体现，而对技术变革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动态性和革命性视而不见。技术变革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调节和自我革新的重要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技术创新可以强化社会分工，推进产业的分化并产生新的社会生产部门，这促使物质生产力呈几何级数增长。技术创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它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提供物质基础。

其次，技术封建主义思潮错误地将技术变革视为社会结构固化的原因，而没有认识到技术变革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技术的运用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脸书或谷歌的公关人员如何极力辩解，管理社交媒体的算法都不是中立或客观的，而是反映了程序创建者的假设。”^②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其“资本主义的应用”。

最后，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未来持悲观态度，认为技术变革将导致社会结构固化，进而出现新等级制。然而，这种观点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技术变革所产生的双刃剑效应不以为意。一方面，技术变革可能被资本家用来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控制；另一方面，技术变革也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力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技术变革最终可能促使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而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提供条件。“这并不是重新回到以前的时代。相反，它是社会变革的矛盾结果，社会变革将‘旧’变成了‘新’，从而在财富、认可和权力分配方面产生了‘新封建’模式。”^③

① Stan Harrison, "Digital Feudalism: Sharecropping, Ground Rent, and Tribute", *Rethinking Marxism*, Vol. 33, Issue. 2, 2021.

② Joel Kotkin, *The Coming of Neo Feudalism: A Warning to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20, pp. 155-156.

③ Sighard Neckel, "The Refeudaliza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6, No. 3, 2019.

技术封建主义思潮认为，信息技术的变革造成资本主义向封建主义“复归”，数字产权、平台垄断与集中化导致资本家成为封建领主式的食利者。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技术变革的误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技术变革并不会导致封建主义的复归，这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调整和自我革新。技术封建主义的观点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动态变化和自我调节能力，以及技术变革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具有的潜力。

3. 对劳动者主体地位的误读：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当代转型

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中，技术进步和数字化转型带来深刻的变化。在西方左翼技术封建主义思潮那里，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被重新定义，他们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是成为所谓的“云农奴”。这一概念源自雅尼斯·瓦鲁法基斯等人的理论。他们认为，在云资本的控制下，劳动者的劳动被算法控制和加速，个人数据被无偿使用，这在无形中为云资本家提供了增加其资本价值的免费劳动力。这种转变不仅是对劳动者经济地位的调整，更是对其主体性的重塑：他们从传统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却又以一种新的依附形式被束缚于数字平台。然而，尽管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看到新出现的现象，但忽视了背后更为深层次的本质。

首先，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将劳动者在数字资本主义中的角色简化为“云农奴”，这种观点轻视了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劳动者不仅是被剥削的对象，而且也是社会变革和技术创新的推动者。这种误读没有充分认识到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其次，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工作组织形式以及劳资互动模式都在发生变化。例如，数字平台的流行使得劳动者能够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参与生产活动，同时也诱使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控制更加隐蔽和间接。这种转型并不意味着劳动者主体地位的消失，而只是其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发生了变化。“数字帝国主义国家的目的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用户都集中在本国所搭建的平台之上，将平台变为掠夺财富的全新殖民地。”^①

再次，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数字技术的发展促成劳动者能够以新的方式接触和使用生产资料，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劳资关系。哈里森正确地指出：“土地所有者和被剥削的佃农的形象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标志。”^②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得到增强，而是资本家凭借新的形式（如平台、算法等）对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进行控制。

最后，新技术革命推动企业生产组织形态向去中心化、自组织化方向变革，形成“数字技术-平台制组织-算法管理”的技术-组织-管理范式。这种变革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自主性和合作机会，但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如工作不稳定、劳动权益保护不足等问题。

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对劳动者主体地位的误读，以及对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当代转型的误解，需要通过深入分析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新角色和新挑战来予以纠正。“平台资本的残酷逻辑正在将本已相当凄凉的全球劳动力市场转变成一个临时和短暂就业的灰色地带。”^③只有透过“云农奴”的幻象，才能看到其背后的实质仍然是劳动者在平台资本主义下被剥削的残酷现实。

4. 对民主政治实质的误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机制

西方左翼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解，往往忽略其阶级性、进步性和适应性，

① 刘皓琰：《数字帝国主义是如何进行掠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1期。

② Stan Harrison, “Digital Feudalism: Sharecropping, Ground Rent, and Tribute”, *Rethinking Marxism*, Vol. 33, Issue. 2, 2021.

③ [英] 菲尔·琼斯：《后工作时代：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力》，陈广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第4页。

而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向封建主义的“复归”和民主政治的局限性。这种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实质的误解。

首先，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往往忽略资本主义民主的阶级性。资本主义民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它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且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实行政治统治的一种形式。然而，技术封建主义思潮错误地将资本主义民主视为一种普遍适用的、超越阶级的制度，进而对其服务特定阶级利益的本质置之不理。

其次，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夸大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局限性，认为它正在转变为一种新的封建主义形式。这种观点没有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对封建专制政治的超越作用，以及它在形式上实现人民主权原则、选举制和公民政治上的平等权利等方面所具有的进步性。

再次，技术封建主义思潮误解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这种制度下，政治权力的分配和行使最终是为了维护资本的利益。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对这一点视若无睹，片面强调民主形式的表面变化，如网络平台和数字知识产权的集中化，而没有深入分析这些变化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动力。

最后，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将资本主义民主与技术封建主义对立起来，并将后者视为前者的衰退和替代。技术封建主义思潮认为，信息技术的变革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而是引发资本主义向封建主义复归。在这种观点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被看作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则是一种新的封建主义形式正在形成，其中数字产权、平台垄断与集中促使资本家成为封建领主式的食利者。然而，这种观点没有充分考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适应性和变革能力。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并非静止不变，它能够依靠改革和调整来应对新的社会经济挑战，包括技术变革带来的危机。在莱斯利·斯克莱尔看来，在19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中，跨国资本家阶级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支配范围的扩展和支配程度的深化，正在通过提供资源、提供种种形式的组织能力，通过澄清资本主义之外其他形式的全球化的目的，播下这种支配性体系发生大转变的种子”^①。跨国资本家阶级、金融寡头和技术寡头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表现。

对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技术封建主义思潮不仅误读了它的阶级性、局限性和本质，也简单化处理了其与技术封建主义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为维护其经济利益和阶级统治而建立的政治体系，这种体系表面上宣扬民主形式，实际上却限制劳动人民的真正民主权利。技术封建主义思潮不仅没能揭示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真正实质，反而将其简单地归结为一种衰退的封建主义形式。

三、“教训”与“反思”：

辩证看待当代西方左翼技术封建主义思潮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时代背景下，西方左翼技术封建主义思潮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技术进步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思潮虽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发展带来的某些问题，如数字产权的不平等和平台垄断现象，但往往无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资本主义仍朝着它一贯的方向发展，它利用一切资源、一切手段来追求尽可能

^① [英] 莱斯利·斯克莱尔：《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梁光严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页。

多的利润，无论这一手段是投资、创新与经济剥削，还是带有封建因素的租金、征用与掠夺”^①，这正是资本主义扩张的疯狂逻辑。我们必须吸取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警惕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可能带来的误导。同时，我们也要从中获得警示，认识到技术创新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探索如何更好地利用技术进步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推动数字经济有序繁荣的同时，也要注重保护劳动者权益，防止技术成为新的剥削工具，确保技术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经过这样的批判性思考，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技术发展的方向，为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数字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警惕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错误

首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② 在面对西方流行思潮的时候，我们需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第一，始终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分析技术封建主义时，应关注技术发展如何影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不是将技术视为社会变迁的唯一决定因素。第二，认识到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如何利用技术来强化其剥削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③ 应当把关注点放在资本主义如何利用技术手段来追求尽可能多的利润上，而不是简单盯住技术发展所导致的再度封建主义化。第三，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出发，分析技术发展如何加剧或缓解这些矛盾，而不是简单地接受技术封建主义的论述。第四，坚持阶级分析方法，运用阶级分析的工具来审视技术封建主义，分析技术发展如何影响不同社会阶级的利益，特别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

其次，要高度警惕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迷惑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时特别指出：“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劳动的社会规定所具有的物的外观，使一部分经济学家迷惑到什么程度，也可以从关于自然在交换价值的形成中的作用所进行的枯燥无味的争论中得到证明。”^④ 对于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我们也需要引起重视，以免被纷繁复杂的表象所迷惑而失却对事物本质的把握。第一，警惕对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特征的混淆。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将现代资本主义中的某些现象，如数据殖民、平台垄断和集中化，与封建主义的特征相提并论，从而模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区别。第二，警惕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误解。技术封建主义思潮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被封建生产方式所取代，这种观点未能充分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适应性和变革能力，即它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来维持和强化其生产关系。第三，警惕“技术决定论”的嫌疑和倾向。在分析社会变迁时，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往往过分强调技术的作用，这可能产生“技术决定论”的倾向，即认为技术发展是社会变化的唯一或主要驱动力，进而对社会结构、文化、政治等其他因素视若无睹。

最后，要持续深化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第一，我们应该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自我革新和自我调整能力，这是资本主义能够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资本主义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增强其扩展能力和生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得到解决。正如马

① 吴鑫：《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批判》，《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

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①。第二，我们应该看到技术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可能加剧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如剥削和阶级对立。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忽视资本主义利用技术追求利润的本质，而过分强调技术带来的封建化倾向。第三，我们应该以批判性的视角看待技术封建主义思潮，识破其本质，即它是旧有理论无力解释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产物。这种思潮反映出以技术封建主义思潮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日益远离马克思主义的危险趋势。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认识到资本主义仍然在追求利润和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道路上发展，无论是通过经济剥削的方式，还是带有封建因素的租金、征用与掠夺的方式。第四，我们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未来趋势。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其最终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命运。我们应该关注资本主义如何利用技术来增强其剥削机制，同时探索社会主义如何利用技术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变化，并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数字经济与建设数字中国

当今，中国正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数字中国与发展数字经济。这一进程不仅是对西方技术封建主义的一种超越，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②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提升数字治理能力，以及确保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等措施，促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创新能力，还能为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中国方案，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开放、包容的数字经济体系。经过这些努力，中国旨在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首先，规范数字资本的发展，以确保市场公平与创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要设立‘红绿灯’，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③ 第一，加强数字资本监管。为防范数字资本无序扩张，必须加强监管机制的建设。这包括完善法律法规，确保数据的安全和隐私，防止数字平台扰乱市场秩序，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第二，坚持以人为本的技术应用。数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应以满足人民的实际需求为目标，而非作为资本增殖的工具。第三，坚持劳动逻辑优先。在数字时代，应坚持人的劳动逻辑驾驭数字资本逻辑，确保数字劳动不被资本所奴役，而是成为解放人的手段。这要求尊重劳动者在数字化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

其次，重视数字经济的作用，强化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把握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并应对其挑战，在国家层面要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互联网和5G，以支持数据的快速流通。同时，为了提升数据价值并保持国际竞争力，国家需要建立数据资源体系并推动技术创新。此外，强化数字安全、优化治理体系并培养数字人才，这对于保护数据和隐私、提高全民数字素养同样重要。这些措施将共同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融合，为国家的持续发展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再次，加强平台经济的监管，防止市场垄断和维护公平竞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数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0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20页。

经济健康发展，要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① 为预防市场垄断并促进公平竞争，需要强化平台经济的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平台责任，加强常态化监管，并提高政府的数字化治理能力。这包括制定严格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措施，大力倡导创新，鼓励新进入者参与市场竞争，以及通过反垄断执法确保市场的“可竞争性”。通过这些综合措施，一个健康、合理、有序的数字经济环境将得以建立和完善。

最后，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促进数字时代的社会公平。在数字时代，为维护劳动者权益和社会公平，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更新劳动法规以适应新兴工作模式，强化劳动者权益保护；提高公众的数字素养，扩大数字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加强数据安全保护，促进财富合理分配；防止市场垄断行为，鼓励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同时，加强政府监管，确保各方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总体而言，要通过法律、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监管，确保数字经济的红利公平分配，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②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强调，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必须统筹国内国际大局，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以强化我国数字经济的竞争力。这要求我们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健全数字基础设施，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并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多措并举推进数字经济有序发展，维护市场公平，激发创新活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胡大平：《作为人类社会生产条件的技术及其自主化——重申历史唯物主义视角》，《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6期。
- [2] 涂良川、潘依林：《技术封建主义：科技进步的政治退步——当代西方左翼“技术封建理性批判”刍议》，《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 [3] 蓝江：《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
- [4] [加拿大] 尼克·迪尔-维斯福特：《赛博无产阶级》，燕连福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
- [5] [埃及] 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 [6] [美] 玛丽·L. 格雷、西达尔特·苏里：《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左安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 [7] 彭诚信主编：《数据正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 [8] 陈琼：《数字新经济：数字经济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23年。

（编辑：张 剑）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07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06页。